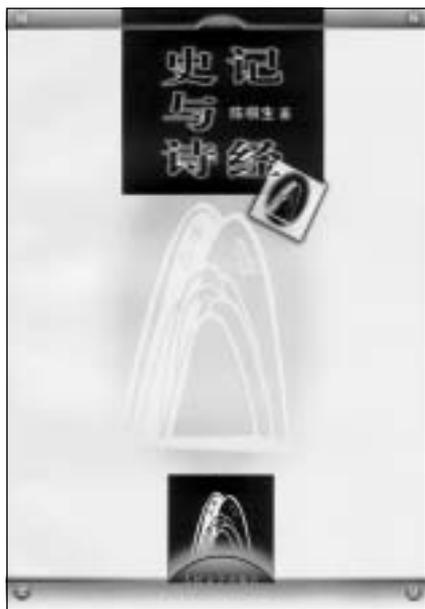


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？

● 遇資州



陳桐生：《史記與詩經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0）。

治中國哲學的少有不引徵司馬遷，但很少有人專講甚麼「司馬遷哲學」。這種提法聽起來就彘扭。不過，翻開如今的中國哲學史、思想史各種標準或準教科書，又無不見到說司馬遷的思想或哲學。怎樣一個思想或哲學法？讀陳桐生著《史記與詩經》，不由得不想這個問題。

司馬遷是史家，這誰都曉得。他也是哲學家？讀陳桐生著《史記與詩經》，不由得不想這個問題。

初看書名，還以為陳著要講司馬遷如何從《詩經》中「實錄」史料。如今的古典學研究，大多不過像錢穆史學「實錄」、爬梳史料，陳著雖有「實錄」，卻重在辯析司馬遷如何賡續孔子存「王道哲學」的命脈。

從史學史角度看，司馬遷與孔子的關係是明擺着的：孔子作《春秋》乃賡續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無論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」（《孟子·離婁·

下》），還是「《書》亡而入於《春秋》，皆天時人事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……司馬遷紹法《春秋》，而刪潤典謨，以入紀傳」（章學誠：《文史通義·書教·上》）。問題是，如果孔子「作」《春秋》是哲人的「作法」，司馬遷「紹法」孔子不也成了哲人？

治中國哲學的少有不引徵司馬遷，但很少有人專講甚麼「司馬遷哲學」。這種提法聽起來就彘扭。不過，翻開如今的中國哲學史、思想史各種標準或準教科書，又無不見到說司馬遷的思想或哲學。怎樣一個思想或哲學法？

據說司馬遷雖師從董仲舒公羊學，「卻能保持清醒頭腦，不受偏見左右，而是從史實出發，實事求是」（張豈之主編：《中國思想史》〔國家教委審定教材〕，頁128）。於是，司馬遷的偉大思想就是「實錄」精神。但孟子明明說孔子「作」《春秋》只是表面上（「事」、「文」）與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」一樣，「義則丘竊取之」。如果不從史「竊取」「義」，司馬遷何以堪稱「紹法」孔子？

權威的《中國思想通史》說司馬遷「實錄」精神要精緻得多，給他安排了這樣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史位置：司馬遷正值「中國封建制社會法典化的劃期時代」，那個時候，「中國的奧古斯丁」董仲舒綜合「庸俗哲學」（按指公羊學）和宗教（按指五行

災異說)建立了「合法思想」，中國思想史從此進入了中世紀，司馬遷卻能樸素「唯物主義」地站在中世紀之外，「據理恃智」，堅持「百家的異論殊方的傳統」(侯外廬等著：《中國思想史》，卷二，頁132-33)。但司馬遷自己不是說「理不可據，智不可恃。無造福先，無觸禍始。委之自然，終歸一矣」？據說，這話是在「積威約之勢」下不得不說的「隱約」之言，實際上司馬遷「激於義理」敢反「合法思想」。甚麼樣的「義理」？據說，司馬遷信人不信天，「從人類經濟生活方面尋求」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(任繼愈主編：《中國哲學發展史·秦漢卷》，頁311)；甚至肯定「利欲」、批判「仁義」(祝瑞開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，頁142以下)。於是，司馬遷成了「進步」思想家。

這類「主流」中國思想史家對司馬遷哲學的禮讚如今可能已經讓人感到好笑，然而，中學研究儘管不再時興「唯物主義」、「思想進步」之類的說辭，「五四新文化」色彩的教條並沒有絕迹，「唯物主義」不過變成了「民主主義」、「自由主義」，「唯物史觀」不過被文化人類學、歷史社會學代替了。人們熱衷追究中國古典思想中種種現代「主義」的蛛絲馬迹，再不然就把思想史還原為社會史，尋找某種思想在歷史社會中的所謂具體「位置」。

《史記與詩經》說司馬遷思想，筆法不同。全書共260頁，凡九章。第一章辯司馬遷習哪一家《詩》說的舊案，三至七章辯具體的《詩》說(「四始」說、「風雅正變」說、「《商頌》為宋詩」說、「聖人無父感天而生」說)與《史記》的關係，末兩章分別討論《詩經》與司馬遷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」原則的關係和司馬遷本人

對《詩經》的論說。第二章講司馬遷與孔子的關係，篇幅最長(六十餘頁)，乃全書重點。為甚麼？

第二章首先花了大量篇幅討論：有沒有孔子「刪《詩》」這回事？如果有，如何「刪」法？

孔子是否「刪《詩》」乃經學史上一案。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說《詩經》，最後一條即辯論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的孔子「刪《詩》」說。《史記與詩經》的問題可以說是從皮錫瑞對這一經學問題的總結而來。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：中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究竟來自現代的種種「主義」或時髦的人文—社會科學，還是傳統的思想本身。

孔子是否「刪《詩》」與孔子是否作《十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書序》的問題連在一起，涉及對孔子的歷史形象的認證：孔子究竟是哲人，還是整理舊故的學究老儒。今人(如錢穆、馮友蘭)和古人(如朱熹、劉克莊)都否認孔子「刪《詩》」、作《十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書序》。孔子「刪」、「作」是司馬遷第一個加以總結的，「難道司馬遷要與後代的學人開玩笑」(頁47)？

這問題提得好。在思想史上，司馬遷第一個給孔子「作」傳。記載孔子言行的其實很多，比起不著文字的蘇格拉底，有案可查多了(記載孔子言論的，實在太多而且龐雜。參孫星衍等輯、郭沂校補：《孔子集語校補》[齊魯書社，1998])。然而，還原「歷史的孔子」真的那麼有指望？

即便還原出歷史地真實的孔子，仍然與司馬遷記載的孔子不相干。《史記與詩經》承認，將《論語》中的孔子面目與司馬遷的孔子傳比較，司馬遷將孔子「述而不作」改為「刪」述，孔子不再像個失意知識份子，而是「制一王之法以俟後聖」的

孔子是否「刪《詩》」與孔子是否作《十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書序》的問題連在一起，涉及對孔子的歷史形象的認證：孔子究竟是哲人，還是整理舊故的學究老儒。今人(如錢穆、馮友蘭)和古人(如朱熹、劉克莊)都否認孔子「刪《詩》」、作《十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書序》。孔子「刪」、「作」是司馬遷第一個加以總結的。

《史記》與經學不是新題目，但過去《史記》主要被用作今古文雙方攻訐對方的材料。《史記與詩經》的作者則要「從經學角度揭示《史記》的文化學術淵源」，把《史記》變成經學研究中的一題，不僅要突破經學派別論爭的窠臼，還要「深切理解司馬遷以文化道統為己任的偉大心靈」。

立法者，以致被尊為「素王」（頁60）。但《論語》中的孔子就真的「歷史地」真實？不錯，司馬遷將孔子描繪成素王是當時一派儒家（公羊學派）之言，但當時記敘孔子的，哪一個不屬於某一家？初代儒家已經「儒分為八」或別為「孔門四科」，哪一派的記敘是「真的孔子」？

重要的是理解某一派如何理解孔子以及為甚麼如此理解。《史記與詩經》花了相當篇幅講公羊派如何對孔子的理解，以便理解司馬遷為甚麼要如此為孔子立傳。孔子並非諸侯王，司馬遷列孔子入只有諸侯王才佩享用的「世家」，並在十二諸侯世家中插入「孔子生」條，司馬遷筆法的寓意很清楚：孔子為「素王」（頁82）。

如何成為素王？不過用一枝秃筆刪述六經。《太史公自序》將《史記》的學術目的概括為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」，乃是繼承孔子刪述六經的事業，「將經學和諸子之學整合為一個體系，作為現實政治的指導」（頁87）。論者雖然沒有直說，結論必然是：《史記》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次「刪述」，司馬遷「作」《史記》也是要當「素王」。

《史記與詩經》將看《史記》的眼光帶回到今文經學。讀畢此書，我才知道，這是作者第三部研究《史記》的專著（前兩部為《中國史官文化與〈史記〉》〔汕頭大學，1993〕和《史記與今古文經學》〔陝西師範大學，1995〕），三書的主題都是《史記》與經學。

《史記》與經學不是新題目，但過去《史記》主要被用作今古文雙方攻訐對方的材料（《史記與今古文經學》，頁253-70）。作者則要「從經學角度揭示《史記》的文化學術淵源」，把《史記》變成經學研究中的一題，不僅要突破經學派別論爭的窠臼，

還要「深切理解司馬遷以文化道統為己任的偉大心靈」（《史記與今古文經學》，頁31-32）。

司馬遷出於、卻不囿於公羊家，何況他的思想並不亦步亦趨其先師董子。但這不等於說，司馬遷不再是公羊派中人。毋寧說，司馬遷是公羊派中最有心按「口傳」繼承孔子的人。如果孔子生在司馬遷時代，面對那麼多「百家雜語」，他大概也會「厥協」異傳、「整齊」雜語。公羊學在司馬遷那裏，不是守一經之學（董仲舒、何休），而是據公羊「口傳」的孔子筆法刪述史籍。《史記》與《詩經》關係問題的要害正在於此。司馬遷的〈孔子世家〉分明是他悉心體會孔子使命的表達，有如柏拉圖記敘蘇格拉底的對話。《史記》絕非一般所謂史書，而是哲人書。

甚麼樣的哲人？「《春秋》未作以前之詩，皆國史也；人知夫子之刪《詩》，不知其定史。人知夫子之作《春秋》，不知其為續詩」（錢謙益：《有學集》卷十八，〈胡致果詩序〉）。《史記》「紹法」《春秋》不過就是續《詩》定國史。或者將章學誠的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記》的三段論式史學轉換成這樣的歷史理論：《尚書》的「以史為鑒」經孔子的「以史為法」到司馬遷成了「以史立言」。無論那種說法，司馬遷都放棄了「以史立法」的孔子精神，成了歷史理論家。真的是這樣？

關於《史記》的八書，向來訟說紛紜，作者不否認《尚書·堯典》提供了《史記》「八書」原型，但「八書」實為《尚書·堯典》與公羊家哲學結合的產物，「關鍵在於漢家改制」。這說明司馬遷仍然賡續孔子「以史立法」的精神。孟子說孔子「作」《春秋》以後，出現了一系列《春秋》。「春

秋」不再僅指史書，「含義已經由史書而過渡到指代那些專講治國大道的政論著作」（頁59）。「如果說孔子著《春秋》重在創新，刪《詩》就是述舊，創新和述舊形式不同，在繼承王道文化傳統這個大方向上則殊途同歸。《春秋》是制定一王之法，刪《詩》則是為一王之法中的制禮作樂樹立了典範」（頁90）。孔子刪述六藝、把習傳的史書變成具有政治統治法權的經。將經學還原為史學，「經」要麼成了上古史料、要麼真的成了「斷爛朝報」，刪述六藝「當一王之法」的精神就丟失了。

司馬遷的孔子傳說明了他承孔子繼「先哲王」的素王精神，《史記》

筆法只能從孔子「垂空文，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」來理解。這種行為是政治的，是繼孔子立法後的又一次立法行為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孔子是政治哲學家，同樣，《史記》首先是政治哲學，「以三統論和五德說的模式論載歷史」（頁85）。《史記》不能僅僅作為史書來讀，正如不能如此解讀《春秋》。

司馬遷是孔子式的王道哲人，堪稱中國政治哲學史上的大家。蕭公權的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怎麼沒有提到司馬遷？一定是某種「主義」的史學立場蒙住了他的眼睛，就像其師薩拜因的眼睛看不見修習底德是政治哲學家。

司馬遷的孔子傳說明了他承孔子繼「先哲王」的素王精神，《史記》筆法只能從孔子「垂空文，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」來理解。這種行為是政治的，是繼孔子立法後的又一次立法行為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孔子是政治哲學家，同樣，《史記》首先是政治哲學。

政治反對在東歐共產黨國家 民主化轉軌中的作用

- 申明民



Grzegorz Ekiert, *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: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* (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6).

反對與認同（通俗地講就是「敵與友」）是政治科學中最為根本的一對範疇，不同政體就是相異的認同和衝突結構，其性質首先取決於對反對行為的不同制度性安排。